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19.01.005

湖南作家作品研究·《沧浪之水》专辑 主持人:中国作家协会唐伟博士

主持人语:湘籍作家阎真长篇小说《沧浪之水》,堪称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经典之作,也是湖南文学的骄傲。其在2001年甫一问世,即在学界引发过其究竟是“知识分子小说”还是“官场小说”的激烈争论,余波至今仍有未尽之意。《沧浪之水》究竟是“知识分子小说”还是“官场小说”,纠缠于其题材之争,意义不大。重要的或在于,《沧浪之水》所涉的是怎样的“官场”?而作为一个问题域,“知识分子”又是如何被提出的,即小说主人公的知识分子身份究竟是在何种语境中得以确认的?在《沧浪之水》出版近20年后,本期“湖南作家作品研究·《沧浪之水》专辑”,特约三位新锐学者,尝试从不同角度,对此问题予以深入阐释,以期深化对这部经典之作的研究。

永远的乡愁

——重读《沧浪之水》兼论世纪末的一种写作

唐 伟

(中国作家协会 网络文学中心,北京 100013)

摘 要:于世纪之交问世的《沧浪之水》,在世纪末情绪的浸染下,一方面通过“对话”来颠覆中国现代文学中存在的弱势知识分子形象,另一方面则又以“独语”为中介,意欲寻找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故乡。在小说中,知识分子的“我将去往何处”的“位置感”以及“我是谁”的“身世感”,表征为对精神乡愁的形上追问。

关键词:《沧浪之水》;世纪末写作;知识分子;精神乡愁

中图分类号: I207.4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9)04-0041-08

引用格式:唐 伟.永远的乡愁:重读《沧浪之水》兼论世纪末的一种写作[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4(4):41-48.

Forever Homesickness: Rereading the *The Water of the Waves* and Discussing a Writing at the End of the Century

TANG Wei

(Network Literature Center, 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 Beijing 100013, China)

Abstract: *The Water of the Waves* that came out at the end of the century was immersed in the emotions of the end of the century. On the one hand, “dialogue” was used to subvert the image of a weak intellectual in modern

收稿日期:2019-05-28

作者简介:唐 伟(1983—),男,湖南东安人,中国作家协会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Chinese literature, and on the other hand, “monolingual” was used as an intermediary. Looking for the spiritual homeland of modern intellectuals. In the novel, the “sense of position” of the intellectuals “where I will go” and the “sense of life” of “who I am” are characterized by the formal questioning of spiritual nostalgia.

Keywords: *The Water of the Waves*; writing at the end of the century; intellectual; spiritual nostalgia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叙事史,就是一部知识分子的精神乡愁史。如果说,20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先生首开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题材先河,是不自觉地将知识分子的精神乡愁纳入了中国现代文学主题,那么,此后近一个世纪的知识分子叙事史,不过是对乡愁精神的自觉重现或有意的拒绝遗忘。所不同的是后来者的表现策略各异,叙述方式有所调整而已。遵循这一理路,于世纪之初问世的《沧浪之水》能否算作是乡愁的一次回潮抑或终结?

乡愁从来就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自新文学起,中国作家对乡愁的回望和想象,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身兼知识分子身份的现代作家而言,文学叙事语境中的乡愁所侧重的,更多是一种精神层面的意象指归,正如王德威在《想象中国的方法》里面所指出的那样:“‘故乡’因此不仅只是一种地理上的位置,它更代表了作家所向往的生活意义源头,以及作品叙事力量的启动媒介。”^[1]精神归属意义上的“乡愁”,指的是一种深层的家国认同,是现代人在宇宙时空中的本体归属感——借用荣格的话,乡愁是指“有故乡的灵魂”的集体人格。具体到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对古代士大夫以及现代知识分子而言,这种凝聚“集体人格”的“乡愁”指的是一种君子人格。

作为“叙事力量的启动媒介”,“乡愁”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似乎更容易凸显。比如20世纪30年代的现代派诗人,在文学史家看来,他们既感受着古老的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期的历史阵痛,又体验着波特莱尔笔下的都市文明的沉沦与绝望,以及魏尔伦诗行中的颓废的世纪末情绪,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使他们回到内心世界;但他们又无力像波特莱尔(或者如中国的鲁迅)那样严峻地、激烈地自我拷问与分裂,他们中的大多数也无法进入形而上层面的思考,于是“就转向微茫的‘乡愁’”^[2]。对敏感的作家而言,处于转型期的20世纪末,正是这样一个乡愁滋长的高峰期。

我们看到,20世纪末文化界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以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等为代表的文化散文的一纸风行。值得追问的是,文化散文的大行其道,是否只是一个简单的大众文学消费现象?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社会心理呢?认真解读以余秋雨为代表的文化散文,我们不难发现,作家关切的都是人文山水——那种对千百年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文人士大夫)的精神家园不再的遥远寄想跃然纸上,其乡愁韵味溢于言表。余秋雨的散文,“显示出‘文化故乡’与‘精神故乡’在他心中的位置。”^[3]换句话说,文化散文现象所表征的,其实是知识分子的精神乡愁在与世纪末情绪合流后,已然汇成一股潜滋暗长的涌流在地下奔突,知识分子于世纪末寻找精神家园的冲动已成不可阻挡之势,其文学层面的又一例证便是《沧浪之水》的问世。

作为一部现实主义力作,《沧浪之水》自问世以来,赢得了文坛与学界的好评,在社会大众读者群中有着热烈的响应,其印刷了25版、总计30多万册这一不俗的销量便是明证——从这个角度而言,作为一部严肃的纯文学作品,《沧浪之水》也因此有了一般纯文学作品难以具备的社会学意义。但遗憾的是,对于一部印刷25版、总计达30多万册的小说,对于一个“在大学教‘小说艺术’这门课程很多年,非常明白艺术含蓄的重要性”的作家,阎真和他的《沧浪之水》却被大多数批评家作了一种简单的同质处理——他们大都意识到了作品折射出的时代性,却没注意到时代的特殊性;大都意识到了主人公池大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所存在的问题,却忽略了其作为一个普通百姓的人性复杂的一面。换言之,《沧浪之水》是触及到了知识分子的境遇问题,但却不是知识分子题材的简单复制,当然也不是一般人所认为的知识分子与官场的二项叠加那般简单,一如阎真自己所说的那样:“我是一个有学术背景的作家,我写小说的第一步就要考虑景深命题问题。如果

命题太肤浅，或者没有创意，我就要思考再思考，考虑得比较成熟了再动笔。”^{[4]79}从这一角度来说，如果将其不俗的销量与风行的文化散文作为同一种文化现象放在世纪末的特殊时代背景来审视考察，《沧浪之水》可能有着更为深远的思想史价值。

一 对话里的“颠覆”

从小说主题角度而言，《沧浪之水》的叙事框架似乎并没溢出当代文学“知识分子问题叙事”的范畴。所谓“问题叙事”的提出，主要是就知识分子对理想坚守的困惑及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存困境而言的。阎真自己曾表示过《沧浪之水》是“想为知识分子写心的”^[5]。这里的“知识分子”无疑是现实语境中的当代知识分子，而通过《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设置的“精神背景”，也当然是指向传统意义层面的士大夫担当。只要对现当代文学史稍作分析，便不难发现，在知识分子叙事作品中，向来存在着这样一类传统意义上的“弱者”知识分子形象：他们大多出身贫寒，从小与中国传统文化保有一定直接或间接的渊源联系，骨子里浸淫着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人文道德精神基因；同时，他们又大都生活在某种单一的体制之内（比如所属单位），有自己的家庭并要承担各种不同的社会角色：在单位，他们是一般职员或领导；在家里，他们是丈夫、父亲。这类知识分子在日常生活中，不是为家庭负担所累，便是为单位工作所困，大多是那种郁郁不得志的多余人，在世俗生活中属于不折不扣的弱势群体。在早期的现代文学作品中，这类人物有鲁迅笔下的吕纬甫、巴金笔下的汪文宣以及叶圣陶笔下逃难的潘先生等；在当代文学作品中，这类人物有刘震云《一地鸡毛》里的小林、池莉《烦恼人生》里的印家厚等。而《沧浪之水》中的池大为，无疑也属于上述这类传统知识分子：他从小出生在一个贫寒的知识分子家庭里，在小说中，他不仅是作为一个从三山坳走出来的医学院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出现，他同时也是池永昶的儿子、董柳的丈夫、池一波的父亲，以及胡一兵、刘跃进的哥们。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社会角色，即作为卫生厅里的职员、丁小槐的同事。简言之，小说里的池大为并不是单纯的知识分子，更是一个处在各种裙带关系之中的“社会人”。换言之，小说中池大为作

为知识分子的自我身份预设，正是通过他与这些“社会人”的对话与交往来体现的。

在小说中，池大为来卫生厅之初，工作和生活均遭遇了一些挫折。进入省卫生厅工作的第一天，池大为就领教了同事丁小槐官僚体制下单位作风的厉害。不久，在单位人事调整方面又被丁小槐利用。这一阶段的池大为，刚出校门，作为一名相对单纯的知识分子（社会角色没有完全显露出来），其对信仰的追求，让他有足够的力量支撑起对生活的信念，并对未来的工作保有一定的希望。对单位的勾心斗角、投机钻营以及生活中的某些不合理行为，他始终保持着一一定的距离；对同事丁小槐工作上的一些小动作，以及在马厅长面前所表现的奴颜卑膝，他颇为反感；对单位里的一些蝇头小利，他不屑一顾。当池大为与董柳结婚有了自己的家庭之后，之前相对简单封闭的个人生活已不复存在，他不得不承担起一个丈夫的角色。面对强大的生活现实，每当士大夫情怀与妻子的小市民生活趣味发生矛盾时，他便开始产生了对自我价值体系的某种怀疑。“我心中的平静还是被打破了，内心燃起了一种欲求……青春的冲动已经渺远，剩下可以自我安慰的就是自己还可以守着那一份清高，做一个人。”^{[6]107}当然，此时的池大为，对理想和信念的坚守，也还没到动摇的地步。有一点应该指出的是，池大为一再表示人应该追求意义，意义比生活更重要，不然怎么还可以叫人呢？这并非自恋的自语，这里除了表现池大为的知识分子身份之外，更强调的是知识分子那种智力上的优势——即一种对人生和社会的深度理解。

接下来，儿子的出生及随之而来的住房问题，使得池大为由原来对个体生命意义的承担，变成了对家庭生活责任的负担，在企图通过常规方式解决住房困难的希望破灭，而用非正当手段轻易解决难题后，他个人的价值体系开始了第一次动摇裂变：

“我动了一点脑筋，用了一点能人的手段就把问题解决了，其实，也许很多事情都没有自己设想的那么难，问题是自己脸要放得下，把手伸出去，要做的出，要有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6]187}

如果说在这之前他仍然向往、追求终极意义，内心对知识分子的人格操守还有所坚守，那么，儿子的那次意外烫伤住院，则促使他最终“清醒”

过来。在这次意外中,池大为再次见识了钱与权的威力,同时也意识到,为了儿子和妻子的幸福,他必须转型,必须放弃知识分子的尊严。“沿着任何方向去追问这个世界都会遇到精神的狙击,并没有一种生存姿态具有绝对的意义。既然如此,我又何必?”^{[6]119}池大为在这之前的每一次怀疑和动摇,都是一次心理炼狱,而这次的转变,为逼自己就范,他甚至采取一种自虐行为(淋雨、吃烂树叶)来否定自己此前所坚持的人生哲学。在决定出卖灵魂、向现实投降的那一刻,他甚至做出了自辱性的行为:“忽然鬼使神差地,我身子往前一窜,双手就撑在了地上。我四肢着地爬了几步,昂着头把牙齿呲了出来磕得直响;又把舌头伸出来垂着,在心里汪汪地叫了几声。”^{[6]127}这种质的转变对池大为来说不可谓不痛苦,不可谓不惨烈。在打破“入世”的心理障碍之后,他终于步入“人生正轨”,平步青云,晋身进阶,一直到后来荣登厅长之位,完成了池大为向池厅长的蜕变。

小说中池大为的境遇,并非是一个文学个案。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由彼岸形上世界被迫向世俗世界屈服的痛苦,在当代作家笔下早就有不同程度和不同形式的反映。在刘震云的《一地鸡毛》中,小说以“小林家一斤豆腐馊了”这样沮丧的叙述开篇,描写了单位小职员小林面对诗意消解的日常生活磨砺,变得既无奈又无助,“尽管一地鸡毛的叙写是这样的低调和平淡,但绝望的情绪还是曲折的传达出来……对于知识分子立场艰难的保持,它活生生地勾画出对现实无可抗争的处境,揭示出这处境的荒谬。”^[7]类似于小林这样普通知识分子的“烦恼人生”,池莉笔下的印家厚也同样感同身受。若再往前追溯,便不难发现,在中国近半个世纪的知识分子叙事作品中,作为文学形象中的知识分子,抑或是作为民间形象中的知识分子,他们要么被生计问题所困扰,要么为理想追求所困惑,不是在历史造成的“伤痕”中舔噬流血的创口中聊以自慰,便是在现实的生活困境中挣扎历练叩问灵魂。如此,知识分子题材作品,长久以来便形成了一种苦闷叙事的灰色基调,而作家似乎也习惯了在此类作品中暴露问题、揭示苦闷的创作程式。如前所述,这种“灰色生活”的暴露和揭示,在《沧浪之水》

中同样有所反映,作者对知识分子心路转变历程的表现,确实非常深刻,显示出了作者不凡的功力。

但较之以往知识分子叙事作品,《沧浪之水》又有它的野心。小说最大的一个不同,是作者为主人公设计了一个“团圆式”的结局——池大为最后当上了卫生厅厅长。而这种“大团圆式”的结局,并非像有论者指出的那样,是出于作者的某种天真构想,这种“浪漫”的结局安排,在小说的开篇就有所暗示。小说的序篇主要讲述了两件事:池大为父亲的逝世和他大学时的一段初恋。池大为与许小曼的爱情则是序篇讲述的主要事件。虽然池大为和许小曼最终没能走到一起,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这段短暂的恋情,无疑是真挚纯洁的——作者让池大为意外得到漂亮高干子弟许小曼的垂青,从世俗层面显示了他与“猪人”竞争的第一回合胜利。这至少让池大为心理上的优越感,得到了他者的肯定,或者说,他的精英主义理想,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了世俗的补偿和回报。池大为在爱情上胜出的“浪漫”结局出现在序篇里,从作家的创作立场细想,这是否隐藏了作家的某种创作意图呢?而只要我们稍回顾文学史,便不难证实《沧浪之水》的确暗藏了别一种意图——情场失意的弱势知识分子数不胜数:《日出》里的方达生、《围城》里的方鸿渐等。那么,我们不禁要问的是,作者让毫无竞争优势的池大为,在爱情竞争中胜出究竟隐含了作家怎样的创作意图呢?或者说是怎样的一种创作无意识?

这看似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但联系文本始末,便不难发现,通过让漂亮的高干子弟爱上穷书生这样的序篇构想,以及故事结尾主人公当上卫生厅一把手这种功成名就的安排,这种“前后呼应”的圆满结局,实际上构成了一种结构上的对称。而这种“大快人心、扬眉吐气”的团圆式写法,也着实让习惯于知识分子苦难灰色结局的读者们眼前一亮。换言之,作家一反文学史上同类题材灰色苦闷结局常态的设计,颠覆的是现当代文学史中一类弱势知识分子的形象。下面我们将通过细读文本,对小说可能存在的这种潜在意图,作进一步的实证考量。

在《沧浪之水》中,小说文本意义的呈现,是通过同一单元或不同单元间的人物对话来展开实现的。在《沧浪之水》中,根据人物禀性可将

主要人物分成几个不同的人物单元：知识分子（池大为、胡一兵、刘跃进、晏之鹤），俗吏官僚（马垂章、丁小槐、施厅长等）、小市民（董柳、任志强、董卉）。所谓的意图“颠覆”，正是通过不同人物的对话来实现。在池大为与许小曼、胡一兵等人的多次交流中，表达了他对这个世俗世界的理解和看法，显示了他作为知识分子的优越感与自信心：

其实我也不蠢，我明白怎么操作才是正确的方向。^{[6]116}

我也不是看不清局面，有时候也想顺势入局，如鱼得水。^{[6]173}

我是想抓住这个机会给自己一个证明，对世界我并不是那样无能为力。^{[6]181}

不难看出，在与他者的对话中，池大为显示了他对市场操作的深度理解。借用王小波的话说，对知识分子而言，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的精英更重要。从某种角度来说，智力优势（亦即思维能力，包括对社会的理解）是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自然属性”，其次才是精神上的优越。小说中，池大为显然不是在智力上输于丁小槐等人，故事从一开始也意图表明，阻碍池大为“入世”的最大敌人是他自己，而并非丁小槐之流，他只不过是愿参与以人格尊严为代价换来的现实利益分配而已。

这点从作者为小说人物的命名同样也可见一斑。通常小说人物命名是一种合目的的同义选择过程，即作家遵照一定创作动机和意图，通过相关性或相似性的联系，在若干同义的形式中选择适合人物性格的名字为人物命名。在《沧浪之水》中，小说主人公名为“池大为”，“池”的谐音字是“迟”，“大为”即大有作为，大为即一种行动，“池大为”可以理解为“迟到的大有作为”。应该指出的是，这里的“为”是与“能”相对立的，是世俗意义上的“大为”，而并不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之“为”。小说的另一主要人物丁小槐的名字同样颇有寓意，“槐”的谐音字“怀”，“小槐”即“小怀”。《论语·述而》云：“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怀”者，小算盘也，意即只有那些世俗小人才会时刻想着自己的利益，成天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小说中的丁小槐不正是这样的“小怀”之人吗？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通常以道德自任，“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论语·里仁》《论语·宪问》）而“志道”的池大为，与“怀居”的丁小槐，则正好构成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的两个典型。有意思的是，小说中的另一人物马厅长即马垂章的命名同样也颇有寓意。在湖南方言中，“章”谐音“瞻”，“马垂章”即唯厅长“马首是瞻”。

“马首是瞻”原出自《左传·襄公十四年》：“鸡鸣而驾，塞井夷灶，唯余马首是瞻。”意为看着马头的方向决定进退，比喻追随某人行动，这恰恰也符合马垂章专制独裁的官僚作派。

至此，我们不难解读出“颠覆”在小说中的具体释义：知识分子全然不是常人看起来的那么愚笨、那么迂腐不堪，只不过是他们内心有所坚守、有所担当而已。换言之，不为者非不能也。在小说中，细读文本便可发现，小说中像“做得出”“出手”“行动”等这样意指性非常强的词频频出现，这也一再表明从一开始，池大为并不是不具备“入世”的能力，而只是不想将这种能力付诸“做”和“为”的实践而已。

如果回到作家的身份上来解读作家这种潜在的创作意图，则更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上述“颠覆”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作家阎真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受过正规的学术训练，具有扎实的文学史知识，换言之，阎真是一位文学史视野开阔的作家，同时他又是一位有着丰富阅读经验的读者。基于作家双重身份的考虑，他对以往知识分子题材作品灰色叙事构成的知识分子的“负面”社会影响肯定也有他自己的考虑。而更重要的一点是，阎真本人不仅是一名人文知识分子，也是一名普通百姓，他应该也敏锐地意识到了社会对知识分子的认可（不是简单的认同）危机。对社会受众来说，要想在一个物化的世界，在他们面前树立起这类弱者知识分子的生存自信，如果仍沿用以往作品中的那种知识分子精神优越的叙事策略，显然不现实，也不明智。通过小说结局，即在社会竞争层面让知识分子大获全胜显然才是最好的选择，也才最具说服力。这其实也牵涉到另一个问题，即作家的读者设定问题。针对一些批评家指出《沧浪之水》艺术水准不够高的问题，作者曾表示，“毕竟我的小说不是写给专门的批评家看的，主要读

者还是普通知识分子……这个问题我自己很苦恼,苦恼之后还是决定照顾一般读者的阅读要求。”^{[4]71}那么作者做出偏向普通读者的决定,究竟是出于怎样的一种考虑?综上分析,答案不言自明:作者正是通过文本与民间的潜对话,来完成预设中的“颠覆”。而从接受美学的社会学角度而言,这种策略对改变知识分子的文学形象或许真有一定的“颠覆”意义。

二 独语中的“找寻”

如果说,上述分析指明的是作家欲通过小说与社会的潜对话,来颠覆文学史中那类弱势知识分子的形象的话,那么,在小说中,作家通过人物内心独白寻索精神乡愁,则是知识分子发出的低吟呢喃,小说的意义也正在于此。

在小说中,池大为有过两次在街上漫无目的的游荡经历,且这两次的场景描述也特别值得玩味。有一次,他在家闲着没事,孤身一人坐上公交车去到了大叶山云峰寺。在云峰寺,池大为目睹寺庙的种种景象,想起了知识分子的担当,以及人生意义的归宿等问题。另一次,下班后他一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走路走过头,走到了一个叫若斯教堂的地方。在教堂里,池大为想到了世界、历史、人的意义及死亡等形而上的问题,而当一个牧师朝他走来的时候,他却快速跑出了教堂。

这是小说中池大为仅有的两次跟宗教亲密接触的描写:第一次是跟佛教有关,第二次是跟基督教有关。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次经历,作者都花费了大量的笔墨来加以描述。池大为对宗教有自己的理解。在云峰寺,他曾承认自己是一个无神论者;而在若斯教堂,他却意识到用无神论证明宗教的虚妄,是没有说服力的。这两次经历显示了他与宗教的距离,但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名中国知识分子对待宗教的那种矛盾心理。池大为对宗教的矛盾心理,反映的是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和精神焦虑。按照余英时先生的观点,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即士阶层,虽然发生了超越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分化,但这两个世界却不是完全隔绝的;超越世界的“道”和现实世界的“人伦之用”之间,是一种不即不离的关系。^[8]中国知识分子不像西方知识分子那样,有“静观的人生”与“行动的人生”这样的本体和现象世界的

二元划分,即“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中国知识分子没有纯粹的宗教信仰,常常在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混沌中纠缠不清。对持唯物史观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他们一直没有放弃对精神家园的找寻,但因为不相信上帝,他们也只能在世俗的人间寻找意义寄托,但有限和残缺的现实世界,却又偏偏无法提供这种依据。当人间社会与他们的理想世界差距太大、变得不堪入目时,那种无“家”可归的悬浮感、无可附着的漂泊感也随之而来。池大为正好是这样的典型:在生活中,他不想做个俗人、猪人,却又找不到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找不到彼岸意义的归宿。但痛苦归痛苦,生活还得继续,为人夫、为人父的池大为,既然不能承担天下的责任,便只能承担起家庭的重担。对家人来说,世俗的生活、世俗的幸福才是最真实的。于是他只能顺应历史潮流选择入世。从这个角度说,池大为的“入世”既是出于无奈,又多少有点献祭的意味。

当上厅长的池大为,怀着“在其位,谋其政”的信念,的确也想一展“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抱负,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完成一个知识分子的承担,“一时间我下了决心要在自己心中重建崇高,重建神圣。今天我有机会了,终于有机会了,我能不好好地认真地做几件事情吗?”^{[6]146}追求自由、民主历来是知识分子的天性,池大为也不例外。上台伊始,他想在卫生厅推进民主政治建设,进行厅政公开,他想“创造一个奇迹,在卫生厅把对话的渠道建立起来”^{[6]150}。但由于其他领导班子成员消极态度,计划还未实施,便已基本宣告胎死腹中;接下来雄心勃勃的查处单位小金库行动,也同样由于既得利益者的阻挠,最后以失败告终。由此,池大为新的苦闷也因此随之而来:“这里有一种势,谁也无法阻挡,这又是一个局,无人可以超越……我经历了千山万水千难万险千辛万苦走到今天本来是为了做点事的,但事情却由不得我。”^{[6]152}如果说,作为一名小职员池大为,面对生活中的无奈,依然还保有一份精神上的优越和自信的话,那么当上厅长后的池大为面对工作中的这种无奈,则感到了彻底的绝望和无助——因为在这之前,这种无奈他根本没有预料到。于是,作为知识分子的池大为的另一种承担的希望也落空了。如果说池大为“穷不能独善其身、达不能

兼济天下”，两次承担的先后落空有着深刻的性格内因，那么，这性格中最大的一个特点便是处事认真、坚持做人的原则性，有着强烈的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人文主义情怀。人文情怀在小说中的具体释义，表现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知行合一传统。

知行思想在中国早有渊源，知和行原本属于中国哲学史上的认识论范畴，后历经演变，才逐渐成为中国儒生们的“修齐治平”的内在要求。知行思想发展到宋代，程朱理学进一步深化之，强调格物穷理、知先行后。明确而系统地提出知行合一思想的是王阳明，他强调“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可以知致知之必在行，而行之不可以为致知也明矣”。^[9]知行合一思想注重形而上的价值超越，同时也强调道德实践，具体地说，知行合一的思想，并不停留在现实的道德知觉与道德行为的互发并进、依存统一的表象层面，而是从道德知觉与道德行为内在合一的本体层面强调实践。池大为从父亲那里接过来的《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上的古代文化名人无不是知行合一的典范：陶渊明以躬耕南阳实现了他安贫乐道的人生哲学；谭嗣同以流血牺牲践行变法的志向；屈原以投江殉身的方式完成了他矢志不渝的理想。《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无疑是结构小说的一个支点。阎真坦言：“我的小说以《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为范式，为主人公池大为设计了精神背景。”^{[4]99}《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不仅是知行合一思想的载体，而且是暗藏于小说始末的一道隐形线索。在小说的结尾，这条隐形线索终于浮出水面。如果说这些历史中的古代文化名人，离现实生活中的他还比较遥远的话，那么父亲池永昶则是他身边的典范：池永昶以“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代价，以自己清白的一生，践行了“做个好人”的道德理想。古人和自己父亲以身表率、知行合一的入世精神，深刻影响了池大为。

应该指出的是，池大为对知识分子的道德操守和责任承担从来没有完全放弃，也正是又因为这一点，导致他当上厅长后再一次地陷入困惑。当厅长前的池大为，是想通过出淤泥而不染保持自己的清高来践行知行合一。当这种独善其身的方式宣告失败后，当上厅长的池大为，虽则作为一个精英知识分子的身份已不再完整，但他还是试图通过另一种方式来践行知行合一的传统。不

过最后的结局是，他对知行合一传统的两次践行，均遭遇了彻头彻尾的失败。

小说时间的1999年12月30日，池大为、胡一兵、刘跃进一行三人荣归故里、重回三山坳，他们是带着一种精神乡愁回到了三山坳，“三山坳没有很大的变化……若不是人的兴衰，时间就像没有从这里经过。”^{[6]216}三山坳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但池大为早已不再是当年的“大为崽”了，胡一兵、刘跃进也早已不是当年的胡一兵和刘跃进了，历经商业文明的熏陶洗礼，他们早已脱胎换骨。他们回到了家乡，却回不了家。在回到三山坳的第二天，即小说时间的1999年的12月31日，池大为独自一人去给父亲上坟，在父亲坟前，池大为烧掉了自己珍藏多年的《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这无疑是池大为早就酝酿好的，选择在父亲的坟前烧掉《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由此可见它在池大为心目中的位置。“1999年12月31日”是20世纪的最后一天，是新千年来临前的最后一天，在这一天烧掉《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无疑极具仪式感和象征意味：它表征了一个旧时代的结束，标志中国知识分子古老精神家园的永远失落。如果说在这之前，池大为一直都在现实生活中苦苦寻找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那么《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就是这种精神乡愁的唯一凭证，而现在这份精神乡愁的唯一凭证也被烧掉了，乡愁便只能永存记忆中了。

《沧浪之水》自问世以来，虽说有不俗的销量，可也面临着一种较为尴尬的处境：它以其不俗的销量，赢得了普通读者的欢迎和喜爱，但批评界却对此视而不见，或者说，虽则关注到了小说的畅销，但并没能对小说的一纸风行给出合理的解释。批评者们关注的是小说显而易见的“艺术纰漏”，或是纠缠于有关知识分子堕落的问题，按照想当然的思维定势，将作品简单定性，对人物下粗暴结论，比如多数批评家都认为池大为到后来还是堕落了。诚如笔者的分析，如果池大为是被逼无奈，那么“堕落”这样一个带有道德批判色彩的语词用在他身上是否恰当合适？作者一再表示：“我的初衷不是对事物进行道德化的思考，因此没有过多地拷问主人公。”^{[4]78}也许，特殊的时代和人性的复杂所呈现的真实，才是作者真正想要强调的，“作为一个小说作者，我第一是要

面对真实,这是第一原则,第二才是理想。”^{[4]99}这里强调的“真实”,显然不止是艺术的真实,更重要的是生活的真实。正如作者所言:“想要住好一点的房子,想妻子有一份好一点的工作,想儿子上一个好一些的幼儿园,这到底是‘需求’还是‘欲求’呢?如果他连这些问题都无法解决,他的虚荣心优越感又何从谈起?我看不出‘需求’和‘欲求’之间的截然分野,在理论上似乎是两回事,生活实践中却是一回事。”^{[4]101}“需求”和“欲求”难分,不正是现实生活中最大的一种“真实”?

让我们回到开篇提到的问题。《沧浪之水》和文化散文在世纪之交的一纸风行,或不是一种巧合的文化现象,而是有着它的内在根由。余秋雨曾在《山居笔记》的“小引”里说,他要借山水风物与历史精魂默默对话,寻找自己在辽阔的时间和空间中的生命坐标。事实上,阎真自己也曾对文化散文做过认真的思考:“余秋雨先生写了《文化苦旅》《山居笔记》,在虚无主义的历史语境中向传统寻索,试图以此为依托建构当代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的价值平台,这是他散文一纸风行的原因,人们在价值虚无之中还想抓住一点什么,我则认为传统精神资源与今日现实不能发生有效联系,进而提出寻找新的人文理想的话题。”

^{[4]99}但很显然,阎真让池大为烧掉《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只是对传统精神资源作出了一种否定。换句话说,他认为,那种彪炳千秋的君子人格,在现代社会已经没有了适合的土壤。《沧浪之水》一方面是对君子人格的悼亡,但另一方面,作者又并未找到一种新的精神资源。无论对传统精神资源是肯定的取舍,抑或是否定的扬弃,都是作者出于对知识分子精神家园的追寻和思考。这种追寻和思考显然不是个人行为,其在世纪末的中国知识界乃至整个社会,都有一定代表性,这或许正是《沧浪之水》和文化散文能在世纪之交一纸风行的共同原因所在。

综观整部小说,我们看到鲁迅先生笔下知识分子“离去—归来—离去”的“归乡”模式,在《沧浪之水》里真实地得到了重现:从三山坳走出来的穷书生池大为,最终当上了卫生厅厅长,功成名就的池大为回到三山坳,可算是一次衣锦还乡之旅。而待祭奠完死去的父亲后,池大为必然又会再次离去。与鲁迅先生所表现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无根的漂泊一样,阎真所表现的同样是一种更深沉的无家可归的悬浮感、无可附着的漂泊感。唯一不同的是,鲁迅笔下所表现的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与“乡土中国”“在”而不属于的关系,阎真则在乡土的基础上还表现了当代知识分子与“现代都市”的同床异梦。总的说来,《沧浪之水》流露出的那种微茫的精神乡愁,让我们在世纪之交对中国知识分子无根的精神漂泊再次有了切肤的体认。

参考文献:

- [1] 王德威. 想象中国的方法: 历史·小说·叙事 [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8: 225.
- [2] 钱理群, 温儒敏, 吴福辉.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363.
- [3] 朱栋霖, 丁帆, 朱晓进. 中国现代文学史: 1917—1997(上)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204.
- [4] 聂茂. 聂茂与阎真的对话: 转型时期精神逼宫与知识分子的良知拷问 [J]. 芙蓉, 2007(2).
- [5] 阎真. 时代语境中的知识分子: 说说《沧浪之水》[J]. 理论与创作, 2004(1): 53.
- [6] 阎真. 沧浪之水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
- [7] 陈思和.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316.
- [8] 余英时. 士与中国文化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5.
- [9] 陆九渊. 象山语录 阳明传习录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4.

责任编辑: 黄声波